

安化楼的往事与回想(上) ◆ 刘源隆

在北京市南二环广渠门内有一幢形制古朴老旧的九层大楼,在55年前,它以全北京乃至全国“理想住宅”的样板而建立,在商品房出现之前,它是先进与优越的住宅典型,这幢大楼叫做“安化楼”。

上世纪60—80年代,这里的住户曾经是周围人羡慕的对象,他们对于住在这样的“理想住宅”中倍感自豪。但如今在众多现代化住宅楼、写字楼的环绕下,这栋“大跃进”背景下的建筑已经显得破旧且暗淡。再结实、再漂亮的材料也抵不过时间的磨砺与时代的变迁,终有陈旧与没落的时刻。现今,还住在这里的老住户们的优越感已经慢慢变成了对拆迁的期盼与渴望,貌似只有大楼形制的宏大与端庄,还能让人依稀感觉到它曾经辉煌的影子。

共产主义需要怎样的建筑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课题摆在面前: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

1959年,北京市计划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化大楼。最终,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以及崇文区的安化楼相继开工。

1960年的5月,只用了1年时间,安化楼便落成了。

安化楼建筑面积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形,主楼9层、东西两配楼7层;楼层挑高3.2米,其中主楼9层挑高达到5米。据安化楼老住户回忆,从大楼高层向北望去,天安门可以清晰地映入眼中,因为在当时安化楼的周围,尽是一片片的平房,它是北京市当之无愧的“楼王”。

58岁的陈志民是安化楼的老住户,他清楚地记得5岁时,第一次来到安化楼时给他的震撼,“就像电影中老上海的酒店,在周围一众平房中,太显眼了。”

8级花岗岩台阶之上,是大楼的正门。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其中中间门是前后双层的,就像城楼瓮城;近百平米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近门处有两根大红柱子,铺暗红水磨石地;楼内每层的走廊内都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伴随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的讨论,3座公社大楼之一的安化楼作为样板工程在北京动工。住在这里的既有社会名流也有寻常百姓,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几十年过去,依然伫立在北京南二环的安化楼和周边现代化建筑相比,显得有些落寞。



如今的安化楼

刘源隆 摄

装有5盏吊灯,走廊及房间内铺花瓷地砖;大楼中央有两部电梯,这也是新中国建筑史中首次将电梯引入居民楼。

“大门上的把手是镀铜的,电梯是欧洲老式电梯,一道木门还有一道推拉式铁栅栏门,颇具老上海风情,在当时看来只能用‘奢华’形容。”

如此“奢华”的大楼,自然伴随着种种神秘传闻。有人说它是“高干楼”,住这要经过政审,陈志民说:“其实这不过是因为大楼的租赁价格高、物业管理的严谨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而给人造成的误解。”

虽然是共产主义大楼,但楼内的户型并不都是一样。主力户型是带一个卫生间的两居室,套内使用面积为46平米,租金阳面为每月10元,阴面为每月9元,这在60年代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因此也就有一个单元由两户合租的,月租大间5元,小间4元。此外,为了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西配楼每层还有两套三居室,东配楼则都被设计成一居室的单身宿舍。

拥有大楼所有权的崇文区龙潭房管所承担着大楼的物业管理,向安化楼派驻了水暖组、电工班、木工班、电梯班,他们的办公室就安排在了大楼4层,全天候24小时值班。

“现在大部分的小区物业都不如当年的安化

楼。”作为一个地产商人,陈志民对此颇有感触。“当时安化楼还有两个老人做保洁,每天上午用‘锯沫’把全楼上下打扫一遍,楼道里的瓷地砖每天都擦得亮,有时,孩子们玩耍就躺在地上。”

还有传言称,安化楼采取供给制,有社会主义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大楼还为住户们建了托儿所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外界对大楼住户羡慕下的以讹传讹。但不可否认的是,安化楼的配套设施的确极其完善。

“大楼一层有餐厅,不是食堂,可以买饭;崇文区图书馆也在,一层,楼里孩子们看书很方便;紧挨着大楼东边有合作社,针头线脑、副食品那都有卖;大楼西侧有存车处、锅炉房;周围的学校也很多,大多和安化楼同时建成,所以也有配套的含义。崇文区第二幼儿园、崇文小学、幸福二小(现培新小学)、男二十六中(现汇文中学)、女十五中(广渠门中学)都在大楼周围。”说起这些,陈志民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所以60、70年代住在安化楼就是有一种优越感。”

居委会带领下的百姓“社区”

1960年大楼落成后,首批入住的居民是当地安化寺的迁住户,而后不断有家庭条件

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传

潘真

10.思想大转弯

1955年春天,上海政协第一次开会,高振霄是独自去中苏友好大厦会场的。那时候,高式熊已经外出工作,没有时间作陪了。再说,父亲思想通了,精神也爽了起来。此后,他又参加了三四次政协会议,偶尔还在会上有感而发,呼吁要重视国人的书法教育,第二天的报纸也登出了他的意见。

有人悄悄问高式熊:“老先生一向不与政界合作的,哪能对毛泽东倒有感情?”分析下来,“一·二八”“八·一三”老先生都是亲身经历的,当时就怕担上个“赤化”的罪名。到1947年、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是共产党的对手,眼看共产党的部队要过河来了,老百姓怕解放军像传说中那样杀人放火,吓得不得了。可是当发现解放军爱护老百姓,帮助穷困的人,人心就大部分倒向共产党了,不必血战上海了。5月23日上海解放,高式熊跑到弄堂口去看,马路上除了停着坏的坦克车,没有别的异样。而住在江湾花园附近的外甥亲眼看见,解放军进了城,为了不打扰市民正常生活,都是躺在马路上过夜的。然后,又亲历茶话会,亲眼见到陈毅算得上大官了(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出席那么大的场合却轻车简从,面对面握手时才发现他个子并不特别高,但就是让人觉得气场十足……这些,都是促使老太爷思想大转弯的因素。

高式熊印象中,统战部茶话会之前,华东地区办过一次艺术展览,他那时候就见过陈毅市长了。展览会在当时的跑马厅举办,他去那儿临时帮忙,任务是守着签到处,看见要人及时通报文化局领导。有天中午,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刚好都出去吃饭了,陈毅带着一名随员光临。高式熊在报上见过陈毅,认出了他,就一边让人赶紧去找文化局的人回来,一边陪着市长进展厅……

后来在延安西路200号,高式熊陪伴父亲出席茶话会,被人认出,他才知道那是暗中



保护陈毅的公安局便衣警察。

说到便衣警察的认人本领,高式熊实在是佩服得很。有一次,他去探望住在天平路40号的书法家潘伯鹰先生,当时古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先生也在。过了些日子,他打电话找潘,对方回答:“潘公不在,谢老在。”他一惊,对方怎么听出来他就是上次谢老在时去过潘府的人?后来听说,那些都是南京派来的最高级别的接待人员。

父子俩对新诞生的人民政府的好印象,正是从这点点滴的细节中积累起来的。

回头说,高式熊没上过一天学,更从来没上过一天班,在家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旧式文人生活。结婚了,还是没有工作。当时币制特别乱,且贬值得厉害。同一件物事,下班时的价格会与上班时的差好多。进理发店,先不说价,理发完再视飞涨的行情而定。理发过程中,“大头”“小头”忙着兑来换去,门外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好在太史公的字尚行俏,他这个当儿子的也就跟在父亲后面写写字、刻刻章,(用现在的话)自嘲为“啃老族”。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虽已成为知名书画家,但以当时的社会观念,人们普遍看不起书画家,认为画画、写字的不是正常人,属于特殊品种。地区进行“失业人员登记”,他对工作人员说:“我既既就过业,也既没失过业,无所谓登记不登记。”说归这么说,但他自己也觉得要有一份工作,才算正常的社会人。

话说张鲁庵有位邻居叫郑崇兰,开着一家工厂叫上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经营得不错。1954年12月底,鲁庵先生介绍高式熊进了维纳氏厂,使他有了第一份工作。

1955年,郑老板一病不起,托张鲁庵帮忙找人管厂。35岁的高式熊就被带到了郑老板的病榻前。老板对他说道:“我要养病了,这个厂就交给你,你挂个‘资方代理人’的名吧。”说着,交出一个装了厂里人事、设备资料的皮包,让他收好,见机行事,“这就是你的事了!做好做坏,都是你的!”

什么?刚刚上了几个月的班,就要一手接管老板的所有业务?高式熊慌了,自己连起码的经营管理概念也不具备,更别说实践经验了。一点底气都没有,但面对郑老板期待的眼神,他只好应承下来。

5.一见如故

王县老先生进门后给龚自珍的感觉,虽然衣服神情一副浩拓不羁的模样,但也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傲慢。或许应该说,他既然自己来这里,就不是来“摆谱”的。据王县本人称,是一位住李铁拐斜街的名“矮道人”的道士介绍他来的。传说矮道人活了三百余岁,但仍“色如孩,臂能掉千钧”,王县走访道人,道人对他闭目无语。王县蹭蹭良久,道人才对他说道,京师有比他更神奇之人,“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绕之,青霞之下,当为奇士庐,盍求之”。王县说他听了矮道人的话,并不以为真,笑曰:“如师言哉?”笑归笑,王县还是按照他的指点,循着“夜有光……青霞绕之”找过来,没料到就找到了龚自珍的家,碰见了这位看上去英俊挺拔的年轻书生。

居然有此等事?有点像童话故事。是王县先生自己编出来的?听闻龚丽正家公子才学非凡,他想一见,于是编出这段类似皇帝出生,天降蛟龙之类的神话。但此段逸事,白纸黑字,真真切切记载在龚自珍写的《王仲瞿墓表铭》中。

不管是什么缘故,这两位年龄差距很大,但同样都很博学的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相互约定为忘年交,今后常来往。王县愤世嫉俗的举止,犀利深刻的言谈,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肯定对青年龚自珍有很多启迪。龚自珍的思想言行,有多少是受了他的影响,虽然难以做精确的考证,但有影响则是肯定的。龚自珍后期的一些近乎癫狂的举止,难免让人联想到已经故去的王县。那位名王岂孙的老学究在给龚自珍的信函中提到“海内高谈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颠沛以死……”奉劝龚自珍勿学此二人,此“仲瞿”即王县也。

龚自珍与王县的交往密切到何种程度,未见更多记载。可以肯定的是,相识七年后[嘉庆二十一年(1816)],王县曾到上海走访龚自珍,与龚自珍朝夕相处了一个月。他们之间无疑有过难以计数的促膝深谈。

王县虽然一生清贫,但在他娶了继室金孺人后,生活还算能维持。因他的这位妻子也是一位奇女子,不但能诗文,更让人叫绝的是画艺高超。“凡人物、仕女、山水、花卉,悉能师心独运,妙夺古人,尤精画佛,庄严妙丽,得者

宝之。”因而求画者接踵而至,王县夫妇以卖画获得的资费也就能维持生计。两人以诗文书画相商榷,志趣相投,日子过得倒也很充实。遗憾的是,这位才女画家晚年,三十六岁就于王县十年病逝。到了晚年,王县几乎是靠朋友接济生存了。龚自珍曾为金孺人画集作序。

嘉庆二十二年秋(1817),王县病故于吴中华严庵。享年仅五十七岁。龚自珍助其葬于虎丘山,并为之撰墓表铭。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启蒙大家在北京第一次相会。此二人,一人为龚自珍,一人为魏源。

魏源,字默深,别号良图,湖南邵阳人,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这一说法,或许不尽准确。据魏源撰《庵文录序》中说到龚自珍“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按此说法,龚自珍与魏源几乎是同时开始关注西学之书。只是魏源比龚自珍小两岁,又比龚自珍多活了十六年。在龚自珍去世后,魏源激愤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着手编撰奠定他启蒙大家地位的皇皇大著《海国图志》。这部书初始为五十卷,后不久增补到六十卷,到了正式刊布于扬州时已有百卷。这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书中征引了历代史志十四种,古今各种著述七十多种,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如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二十余种。

史家普遍认为,这部世界地理性质的巨著,有三重价值:一是打破了天朝中心的史地理念;二是传播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文化、自然等新知识;三是开启了中国近代“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技术成果的时代风气。

因此,魏源不仅自己研究西学之书,睁开眼睛看世界,更重要的是帮助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虽然,他的整体诗文成就逊于好友龚自珍,仅这一点,他比龚自珍走得更远。龚自珍也曾对如何处置外来入侵者问题写过文章,题为《东南罢番舶议》,谈的是如何对付鸦片毒品贸易问题。此文已散佚。

剑魂箫韵

陈歆耕



宝之。”因而求画者接踵而至,王县夫妇以卖画获得的资费也就能维持生计。两人以诗文书画相商榷,志趣相投,日子过得倒也很充实。遗憾的是,这位才女画家晚年,三十六岁就于王县十年病逝。到了晚年,王县几乎是靠朋友接济生存了。龚自珍曾为金孺人画集作序。

嘉庆二十二年秋(1817),王县病故于吴中华严庵。享年仅五十七岁。龚自珍助其葬于虎丘山,并为之撰墓表铭。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启蒙大家在北京第一次相会。此二人,一人为龚自珍,一人为魏源。魏源,字默深,别号良图,湖南邵阳人,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这一说法,或许不尽准确。据魏源撰《庵文录序》中说到龚自珍“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按此说法,龚自珍与魏源几乎是同时开始关注西学之书。只是魏源比龚自珍小两岁,又比龚自珍多活了十六年。在龚自珍去世后,魏源激愤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着手编撰奠定他启蒙大家地位的皇皇大著《海国图志》。这部书初始为五十卷,后不久增补到六十卷,到了正式刊布于扬州时已有百卷。这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书中征引了历代史志十四种,古今各种著述七十多种,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如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二十余种。